

---

## 抗日战争与知识分子

李 倪

---

综观近代中国变革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回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经过的道路，真是漫长而又曲折，艰辛而又悲壮。而最为惊心动魄，令人感奋和难忘的，是 1931 年到 1945 年的抗日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也是决定中国人民历史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性一战。在这场战争中，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不仅又一次起到了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而且在民族觉醒、动员规模和思想政治境界上，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为了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历史特点，不妨简略回顾一下抗日战争以前 90 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历史路程。还在鸦片战争前后，在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出世之前，一些科举出身的开明士大夫和开明官员，就痛感“天朝”已经受到“外夷”的严重威胁，以魏源、林则徐、姚莹等为代表的“经世派”，即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重新了解世界，以图“御夷”自强，重振国威的主张。随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强烈打击，从“经世派”脱胎而出的洋务思想家们，又进一步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亦即所谓“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和洋务纲领。又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更剧烈的打击和“洋务新政”的破灭，于是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

国近代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领导和发动的戊戌变法。随后，又是八国联军更沉重更酷烈的打击，于是而有准备酝酿已久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就其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来说，也大多是知识分子。辛亥革命虽然在近代中国起了划时代的历史作用，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中国，并没有因为这次革命而得救。于是才有先进知识分子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次变革和革命，都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而每一次变革和革命，又都是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起着先锋作用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这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中，在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奋斗中，探索追求，呕心沥血，备尝艰辛，历经苦难，甚至抛头洒血，献出生命，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宝贵性格。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奉献和不朽功绩。

然而，在我们回顾历史，缅怀这些先驱者和开拓者历史功绩的时候，冷静沉思，正视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人民和先进知识分子90年的探索苦斗，并未真正改变中国的面貌和命运，这使得多少志士仁人，壮志未酬，饮恨终天。中国近代的变革和革命屡受挫折，迭遭失败，这固然与敌对势力强大和困难阻力多端有关，但是从知识分子群体本身来说，确实也存在主观上的局限和弱点。就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言，作为变革和革命领导集团和骨干力量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的变革精神和革命精神，变革的勇气和革命的实践，可谓慷慨悲壮，轰轰烈烈。但是揆诸史实，真正投入变革和革命实践的知识分子，还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活动，并没有使变革和革命成为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共识和共同参与的活动，因而也使变革和革命缺乏真正强大的力量源泉。而且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以及对变革和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都还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不怕屡进屡挫，他们前仆后继，但直到“五四”以前，也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通向光明之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虽然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然而就多数知识分子

来说,在一段时间里,仍然处于傍徨探索之中。正如当年鲁迅引用屈原的《离骚》所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情况,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发生了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化。

## 二

同近代中国以往的历次变革和革命运动相比,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和政治、思想文化活动,至少有如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危机空前的严重性,国家危亡的严峻现实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疯狂性、野蛮性和残暴性,激发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自觉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具有爱国和革命传统并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从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的第二天起,就站到了抗日救国的前列。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愤怒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学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速息内战”,“武装群众”,对日作战。24日至28日,上海、南京数万学生罢课,集会游行,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呐喊。以青年学生为先锋,以文化教育界和文学艺术界为前导的知识分子掀起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纷纷成立。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日群众团体究竟有多少,创作和出版了多少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图书报刊,现在还没很精确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其人数之众,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之广,实为历史所罕见。继“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先后发动

了 1932 年的上海“一二八”事件和 1935 年的“华北事变”。在此期间,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仍然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不抵抗主义方针;另一方面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加紧“围剿”。这种违背民族利益和人民意志的政策,日益引起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不满。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知识分子的抗日救国浪潮也日益高涨。1935 年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1936 年 2 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大推动和加速了全国知识界抗日救国斗争的开展。继 1935 年 12 月和 1936 年 1 月,上海、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及全国各地救亡团体成立之后,1936 年五六月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发起和参加抗日救国团体和活动的知识分子,既包括了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工商实业界等的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新闻出版家,也包括了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种空前广泛群众性的知识分子抗日救亡斗争,在七七事变以后的全民抗日战争中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并进入更高层次。从一二九运动到七七事变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高潮。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上海、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各地各界救国会的成立。在文化界救国会宣言上签名的知识界著名人士 364 人中,几乎包括了当时整个一代名流,既有左翼的学者和文化人,也有中间的爱国正义人士。可以说,除了追随附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很少数人之外,知识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站到了抗日救亡的战线上来了。

二是全民族命运和利益的共同性,决定了抗日救亡总目标的一致性。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各有其不同的阶级属性,不但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和不同的学术文化流派,因而从政治主张到理论观点,从政治问题到学术问题,可以说历来都有分歧,都有争论。而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动荡剧烈,变化迅

速,这种分歧和争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就表现得特别频繁而激烈。如果说,在怎样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实现以前,还有少数知识分子附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意旨,散布一些妥协言论从而引起反驳和争论的话,那么在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和国共合作实现之后,至少在表面上,在公开的言论中,除了极少数叛国投敌的分子而外,在要不要抗日,要不要救国的问题上,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歧和争论的。抗日救国,全民抗战,共赴国难,已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决心。当然,这不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思想政治和理论学术方面,就没有分歧和争论,不但有,而且不少。然而所争论的主题,却不是要不要抗战的问题。在抗日救国这个总目标之下,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动员和团结起来了,共同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以往那些“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善良的愿望和救国方案,都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炸弹、烧杀抢掠的严酷现实面前化作泡影,知识界统统汇集到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强敌日本的外部侵略,激发了民族内部的觉醒;侵略者分裂中国灭亡中国的野心图谋,反而促成了民族内部的团结。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空前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振奋了民族精神。而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这场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由于抗战局势发展,各地区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不同特点。就全国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解放区。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左派文化人以及共产党人中的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他们虽然也从事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但更多的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组织地方抗日游击战争。其中很多人成为地方政权和军队的领导骨干。二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教育界的许多著名人士。他们主要是从事抗日救亡的宣

传教育工作和一些战地服务工作,同时还要同国民党蒋介石限制言论自由、妨碍抗战的言行进行斗争。至于在敌伪统治的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斗争,则处于被禁止、被镇压的恶劣环境,这种斗争只能秘密进行。但是不论哪一种情况,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敌救国的坚强意志和宝贵品格。

有的论者,在评论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关系问题时,不无遗憾地认为,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从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救亡实践,足以说明,在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从来不是对立的,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大敌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如果国都亡了,民族的生存权都丧失了,还有什么启蒙可言!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觉醒,正是在救亡的实践中逐步产生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所谓民主、自由只能是虚幻的东西。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 50 年的中国台湾和十多年的伪满洲国,不但根本没有什么民主自由,而且中国的文化都要被泯灭语言要被禁止使用。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救亡不能不成为最紧迫的中心任务。这个中心任务,并不是由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由客观的现实所决定的。抗日救亡,是民心所向,民气所集,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侵略面前,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唱出了全民族的心声,得到全民族的共鸣。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把它改为“工农兵学商,一齐来启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抗日战争时期,最根本最重要的启蒙,就是“启”民族觉醒之“蒙”,就是唤起亿万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实践,并且在这种实践中提高人民的民族民主觉悟。可以说,历时 15 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既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救亡,又是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民族民主启蒙。

三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这是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深刻思想变化。抗日战争

伊始,就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些进步人士,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到战争的前线去,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过在前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还没有摆脱以先知先觉自居,认为自己高于群众的思想羁绊,还没有真正认识广大工农群众才是抗战力量的泉源。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加以解决,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建树。1939年5月,他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文章中,在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所以全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毛泽东的这个指导思想,随后又在延安整风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分子中,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大大改变了知识分子本身的精神面貌,而且还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和工农群众的结合中,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大创造,也是总结历次变革和革命经验的产物。可惜,在建国以后,特别是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20年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误,走了很大的弯路。特别是在“反右派”和“文革”中,伤害了大量的知

识分子，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必须永远牢记和吸取的惨重教训。不过在纠正“左”的错误和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不应该否定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当然，这种结合，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

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历史特点，当然还不止于上面说的几点。比如说，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走上战场；很多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解放区等等，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 三

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如此广泛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为什么会展现出那样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精神，为什么会展现出那样重要的历史作用？其原因不止一端。这里略述几个主要原因。

侵略必然引起反抗，越是大规模的残暴的侵略，就越是要引起大规模的强烈的反抗。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灭亡和独吞中国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稍有民族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感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日本侵略者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华东华中华南，大半个中国的河山沦于敌手。在日本关东军卵翼之下的“满洲国”，日本侵略者说这是一块“王道乐土”，在所谓“日满亲善”的旗号下，“共存共荣”。实际上居住在东北的三千万中国人，一下子就变成了殖民地奴隶。日本帝国主义用这里三千万中国人的生命、血汗和资源，建立自己的大举侵华的基地。要了解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东北究竟干了些什么，不妨看看近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五本书：《九一八事变》、《东北大讨伐》、《细菌战与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东北经济掠夺》。必须说明，还有许多资料有待陆续出版，即或这套书全部出版，也只是日本侵华罪证的一小部分。日本要把全中国都变成像当年台湾和“满洲国”

那样的殖民地。面临如此险恶悲惨的命运,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如果不做殖民地亡国奴,除了抵抗救亡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

有人可能会说,在日本占领的伪统治区,不是也有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日伪统治者效劳吗!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第一,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敌占区和沦陷区,在日伪机构中服务的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也是被迫的。这正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也有相当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参与军事的或非军事的侵华活动,能说这些日本的知识分子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军国主义分子吗?当然是不能这样说的。至于极少数背叛祖国,甘心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投敌分子,那是为广大人民和爱国知识分子所不齿的民族败类,从他们叛国投敌之日起,就注定了其可耻的历史命运。

除了上述现实的原因之外,知识分子广泛地投入抗日救亡还有深远的历史原因。日本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凶恶更残酷。且不说1874年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就是从甲午到“九一八”,论时间不到40年,在这期间,日本积极参与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动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迫使袁世凯政府承认“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在中国山东的利权;炸死张作霖;制造济南惨案等等。每次战争,每次事件,都给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留下了剧烈的创痛和悲惨的记忆。而制造“九一八”和“七七”事变,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妄图灭亡中国,这么多旧恨新仇,怎能不使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和知识分子奋起反抗!

日本距离中国虽然比欧美要近得多,而且又同属于东亚文化的国度,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文化交流。然而近代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却晚于向西方学习。洋务时期的所谓“洋务”,基本上是仿效和搬用“西洋”之“务”,而对于邻近的“东洋”,却还不甚了然。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势日强,并把扩张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可是直

到甲午战争以前,除了黄遵宪、王韬等少数有识之士外,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情况可以说知之甚少。甲午惨败之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失地丧师、丧权辱国感到痛心疾首,一方面又不得不对日本的勃兴刮目相看,并视为可资学习的榜样。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的思想和心态,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在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时,极力主张仿效日本的政治制度,并认为:“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但变法很快失败,康有为的幻想落空。以后梁启超虽然亡命日本,成为保皇立宪派的主将,并且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也在日本成立,并创刊《民报》。90年代以后,中国在日本的学生人数众多,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大本营都在日本,这些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思想活跃,论战激烈。然而不论哪一派,几乎都不主张学习日本的政治模式,也很少注意介绍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理论。为什么会这样?一则因为日本的近代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从西方学来的,而其“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和军国主义并不符合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理想;更主要的是两派的人们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记忆犹新,而且深知日本侵华居心叵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日本侵略者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些种子到了“九一八”和“七七”之后,就普遍发芽生根,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抗日救亡的一个历史根源。至于更深层的思想历史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浩然正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得到新的继承和发扬。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如此广泛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斗争,固然有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但这决不是说这种斗争是完全自发的行动,即或有时是自发的行动,如果没有坚强的正确的组织领导,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在“九一八”以后的

中国,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谁能真正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们就能够得到人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拥护;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治集团及其领袖,违背人民和民族的意志,不主张抵抗侵略,他们就会失掉民心,失掉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前,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国土沦丧,大敌当前之时,对日妥协,对内进行反共内战,引起了各阶层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对。而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随后又改变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推动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从而吸引了大量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1939年12月,中共又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对进一步克服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等不正确态度,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延安这样一个边远县城,会成为全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向往的“革命圣地”,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不辞千辛万苦奔赴它去。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之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推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但毕竟没有放弃抗战的旗帜,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活动,虽然仍在进行防范和限制,但毕竟还有顾忌和收敛,而不敢再象十年内战时期那样大搞白色恐怖。

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强敌侵略,全民奋起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抗日战争中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而这种优良的传统,理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展,在新的时代,完成新的使命。

本文是作者根据1993年1月在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略加补充而成。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